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纵横谈

核心阅读

通过实践探索,近十年来逐渐形成了历史城市保护与传承的中国模式,“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成为共识。

历史城市的保护与文化遗产是增强大众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也是带动历史城市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新引擎。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2022年3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江西九江市为第141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与180多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一起,构成了中国历史城市风貌与底蕴的主调。如何保护历史城市、传承城市文化,一直以来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国际上形成的一些城市遗产保护的方法、理念对我国历史城市的保护与传承产生了影响。然而,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与西方文明有着很大不同,加之我国人口众多、分布不均,决定了我国的城市遗产保护现状、保护对象和保护方法,与西方有很大差异。通过实践探索,近十年来逐渐形成了历史城市保护与传承的中国模式,“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成为共识。

整体保护才能传承历史文脉

始建于1600多年前的河北正定古城,按照《正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实施了系统的风貌提升和民生改善工程,其中包括阳和楼、城垣和隆兴寺等一批重要遗产保护与活化项目。数十米高的正定南城门,扇形的瓮城、月牙式的月城,城内的隆兴寺、开元寺、临济寺、广惠寺、天宁寺等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人们和谐相处。在正定,没有大拆大建,没有为建古城而迁走老居民,古城的历史与重生的活力相得益彰。

2014年,用时11年探索编制完成的《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获得批复。这是一个将城市遗产保护“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的保护规划。广州市域的管辖范围超过7000平方公里。保护人员将它的自然山水、文化景观、城市形态、聚落格局以及农业遗产统一做了规划,提出了“山、水、城、田、海”特色布局,其保护要素承载了各个时期的完整历史记忆。以革命文物、传统制造业老字号文物等为主体的若干条“文物径”,让文化遗产的保护看得见、摸得着。所谓“文物径”,是指对原有道路的景观环境、标识系统进行统一规划,让游人更快捷方便地认识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念在中国传承有序。梁思成在《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一文中说,保护是创造发展的前提。建筑学家吴良镛对梁思成的理念进行传承发展,在实践中提出“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的理念,成为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规划学家朱自煊长期践行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原则,引入城市设计的科学方法,对城市整体风貌进行保护。整体保护的理念是历史城市保护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很多城市在整体保护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完成了一大批保护遗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

张杰 刘岩



产、传承文化的民生项目,使我国历史城市保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遗产活化激发城市文化活力

近十年来,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开展了丰富而卓有成效的实践。遗产活化成为城市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

“城市双修”,是指有序实施城市的生态修复与城市修补。2018年,“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景德镇现场会暨试点经验交流会”在江西景德镇召开,正是对景德镇以遗产活化带动城市发展的充分肯定。近年来,景德镇确立了以遗产活化激发城市文化活力的目标和路径,在凝练价值、梳理遗产地特色资源的基础上,规划了

遗产资源结构化保护展示利用的蓝图。十年间,御窑厂、陶溪川、陶阳里等一批遗产保护与活化项目逐渐建成,景德镇重新回到艺术陶瓷的世界舞台中心。在这一过程中,遗产活化深刻影响了景德镇的社会生活。从事传统手工业的创业方式成为城市风尚,延续千年的古老产业再次焕发勃勃生机。

遗产活化正成为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之一。在上海,虹口区春阳里、黄浦区承兴里、普陀区金城里的确定为保护保留的风貌街坊,小里弄、石库门和老弄堂等特色建筑被原汁原味地修旧如旧。改造后的历史文化遗产得以持续活化利用,并融入城市,发挥应有功能。

在浙江杭州,良渚遗址的保护、展示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堪称典范:大遗址公园与文化生活在空间、功能上相得益彰。距离杭州不

远的古城绍兴,也充分认识到文化是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长期坚持采取城市开发收益反哺老城保护的策略,让古城的格局、风貌得以完整保存。

从业内关注到全社会共同行动

“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作为福州的文化名片和历史地标,三坊七巷的保护和利用过程较为曲折。近年来,保护历史城市、延续城市文脉,在福州蔚然成风。遗产保护爱好者遍布福州各行各业,民间保护组织遍地开花。截至目前,福州基本实现了每个区县保护活化一条历史老街的目标。与三坊七巷上世纪90年代艰难“保下来”和本世纪初艰苦“用起来”的局面相比,这是何等令人欣慰。

而在“齐多甘泉,冠于天下”的山东济南,泉水申遗的过程也受到了广大市民的

热切关注。市民对泉水的科学使用提出了若干合理的建议,连日常的水位变化也成为市民关注的热点话题,市民代表甚至作为城市代言人走上了申遗陈述的舞台。为了丰富城市的历史记忆,加强风貌整治工作的科学性,相关部门开展了泉城老照片征集活动,广大市民踊跃参加,使乡愁成为泉水遗产保护的巨大社会动力。

历史城市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曾被视为难题。近十年,这种局面得到扭转:创新驱动的导向使得城市投资更加理性和从容,可持续的保护利用成为广为接受的理念。一方面,市民的文化自豪感日渐增强,遗产保护的自觉意识逐渐觉醒;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大拆大建的投入产出思维难以继。此外,政府部门对历史城市保护与传承的相关政策支持越来越具体可行,也从客观上促进了这一共识的达成。

在“多方参与,共建老城”的过程中,几座底蕴深厚的古都走在了探索前沿。北京老城保护采取了“申请式退租”“共生院”等一系列举措,让历史城区的居住条件和文物周边环境得到有效改善。江苏南京小西湖片区尝试政府引导、居民参与的方式,推动城市风貌区的环境与业态提升,进行了“微更新”层面的重要探索。江苏苏州古城是我国历史城市保护的标杆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起,较早提出“一体两翼”发展,建设新城、保护古城的基本思路,让古城留下了相对完整的格局体系和风貌特征。在长期专业保护的基础上,江苏苏州近年来逐渐尝试对历史城市的部分地区进行活化利用,一批社会力量积极投入到历史城区的活化利用项目中来,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成效显著。

实践证明,历史城市的保护与文化遗产是增强大众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也是带动历史城市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新引擎。

(张杰为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刘岩为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规划师)

图①:山东济南大明湖七桥风月景区鸟瞰图。济南市园林规划设计研究院供图

图②:江苏南京老门东修缮后的街巷与传统建筑。曹百强摄

图③:福建福州三坊七巷保护与整治后局部院落鸟瞰图。贾玥摄

图④:江西景德镇彭家弄作坊院。曹百强摄 制图:蔡华伟

考古札记

持续的考古发现,不仅明确了越文化的内涵与变迁,而且丰富了2500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路径,为我们更好地“读懂中国”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考古发现丰富对越文化的认识

吴桐

当我们讨论越国历史时,不断发现的考古材料开始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从1936年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成立算起,越国考古已历经80余年,越文化的面貌正逐渐清晰起来。近年来,浙江衢州衢江区发现多座西周时期高等级土墩墓,还出土了精美的青铜车马器等,一段先越国尘封的历史正在被揭开。

在浙江南部的衢江区云溪乡,2018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已先后发掘庙山尖土墩墓与孟姜村1至3号墩等四座墓葬。除孟姜村2号墩的形制还不明确外,其他三座墓葬都属于西周时期罕见的带墓道、石床、木椁的墓,并且随葬了大量精美的硬陶、原始瓷、青铜器与玉石器。如此考究的营建方式、精致的随葬器物、浩大的工程规模,无不彰显着墓主人身份非同寻常。

这一重要发现不仅丰富了越文化的内涵与面貌,也成为关联浙南闽北地区(包括皖东南与赣东北)同类遗存的纽带。这些遗存散落在浙南闽北各地,普遍随葬青铜器与玉石器,与浙北平原(即越国重要地区)不随葬青铜器的做法有明显区别。衢州高等级土墩墓恰好位于这些分散遗存的中间地带,填补了相互交流往来的道路缺口,因此可以将西周时期的浙南闽北串联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越文化单元。

从文化特征来看,这一时期,浙南闽北与浙北平原应该分属越文化的不同类型;从墓葬等级来看,浙南闽北更可能占据了西周时期越文化的中心地位。这种中心地位的取得,应该主要得益于这一地区与外界的资源流通优势。

夏商时期,浙南闽北便是中原象鼻盃、折肩尊等硬陶与原始瓷的主要产地,西周时更是成为中原王朝重要的原始瓷产地。因此,兼具中原风格与地方特色的青铜容器、车马器才会涌现于浙江衢州、安徽泾溪等交通要地,并且成为高等级墓葬的重要组成。在与中原往来的同时,直口豆、敛口豆等原始瓷的影响也到达岭南一带。浙南闽北墓葬突然出现的成套玉块、凸凹形块等玉石器皆长期流行于岭南,可见两地之间实现了玉瓷资源的双向流通。

随着西周中晚期以来淮夷叛周,南方与中原的联系被突然隔断,浙南闽北逐渐衰落,文化遗存渐趋凋零。在人群迁徙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浙北平原的越国取代浙南闽北,成为新的越文化中心。

春秋早中期的越国,基本延续了西周时期的发展态势,与外界联系较少,社会运行以追求物质财富为重要取向。以丧葬传统为例,越国墓葬的等级构建长期“重富轻贵”,等级差异主要取决于日常陶器用器比如豆碗盂的随葬总数,而且不同等级墓葬的分布空间也相互混杂。到了春秋晚期,越国与中原的联系突然密切,人群流动频繁,中原影响变强。越国的丧葬传统因此转向为“富贵并重”,角形器等财富标志物、甬钟等仿铜礼乐器共同构建出规范森严的等级制度。印山越王陵、安吉八亩墩等贵族墓葬的空间,明显呈现出“独立陵园”的趋向。这也许意味着,越国当时进行了主动转型。也就是说,在灭吴之后,越国将视野投向中原,迁都琅琊,经略中原,“致贡于周”。

经历了春秋战国长时期的分裂,统一成为大势。这种与中原的互动,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陆疆、海疆很多区域文化的发展主线,表现在考古遗迹上就是明显的区域文化因素与中原文化因素的此消彼长。

持续的考古发现,不仅明确了越文化的内涵与变迁,而且丰富了2500年前中华文明走向“多元一体”的路径,为我们更好地“读懂中国”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既要探“源”也要观“流”

李守奎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老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文化遗存丰富,文献记载详备。文明的形态多种多样,在不同地域有不同表现。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科技手段有机结合起来,需要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经过多年努力,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比如农作物的驯化、礼乐的发明与传播,都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关键线索。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

考古学家认为,中国象形文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甚至更早。河南贾湖遗址的龟甲刻符,提供了8000年前早期先民开始探索文字的线索。山西陶寺、浙江良渚、山东丁公等遗址发现了龙山时代少量的文字资料。

近年来,不少学者发现商晚期部分器物上的铭文形态与同时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形态存在差异,或是取象于更早的二里头文化的礼器,这或为夏代已进入文字时代提供了重要佐证。

显然,社会的文化积累不可能一直仅仅依靠口耳相传。政令的颁布、大型工程的管理离不开语言文字的帮助,信仰与思想更需要文字来进行整合传播。从龙山时代、二里头文化再到殷墟,我们可以慢慢勾勒出早期中国文字的演进。而另一方面,从甲骨文到金文,从篆书

到隶书、楷书,不断发展的中国文字,却是脉络清晰,不仅是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中国地域辽阔,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但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却非常牢固,历久弥坚,共同的基因、共同的书写起了巨大作用。中华文明一经诞生,就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各民族不断融合,保持了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而这一切通过不间断的历史记载传承至今。其中,文字的作用不可低估。从这个角度来看,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华文明不仅“源远流”,而且“流长”。因此,我们既可探源,也能观流,更可以溯流而上。探“源”可知来自何处,观“流”可知去向何方。

(作者为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



2010年安阳殷墟大司空村东出土的刻辞卜骨。李守奎供图



浙江衢州发现的西周时期高等级土墩墓出土的部分原始瓷组合。吴桐供图